

单地

时空走廊

关山远

2018 年,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。说起戊戌变法,绕不开一个人:谭嗣同,他是湖南人。湖南,也是中国近现代史无法绕过的一个省份。本文以湖南为观察点,来写四个已被时间淡忘的湖南人,时间环环相扣,命运载沉载浮,由此洞见中国变革之不易。

一

第一个湖南人,叫魏光燾。1894 年农历二月初八,晚上 10 时许,一身血污的魏光燾在部下拼死掩护下,从牛庄开始突围。牛庄在今天的辽宁省海城市,辽河下游以东的一座古老小街镇。今人说起甲午战争,谈的更多的是海战,北洋水师的完败,但陆上战斗同样惨烈。当李鸿章一手打造的北洋水师在燃烧的大海上折戟沉沙时,他的嫡系淮军也在从朝鲜到辽东的广袤大地上溃败。

清廷无奈,想起了帝国曾经的“救火队”——湘军。

1866 年初,广东梅州,太平天国残军谭体元部十万余人,被湘军围歼。至此,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兴起的湘军,完成了历史使命。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曾国藩,是个有大智慧的人,他深知满清贵族对于一个掌握着庞大军队的汉人的忌怵,太平天国没了,湘军也该解甲归田了。曾国藩大幅裁撤湘军,有效化解了满人的猜忌。但湘军又有新的历史使命,晚清内忧外患,正规军绿营早已是烂泥扶不上墙,余下的湘军,还得继续为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,东奔西走,南征北战。最辉煌的战绩,当然要数左宗棠率湘湘子弟收复新疆失地。

魏光燾就在左宗棠麾下,他是邵阳人,出身贫苦,曾经当过厨子,从军后,屡立战功。新疆建省后,第一任巡抚为湘军名将刘锦棠,魏光燾任第一任布政使(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),政声卓著。甲午战争爆发,清军一溃千里,走投无路的清廷,想起了被冷落已久的湘军。魏光燾此时正在老家为亡母守制,应诏就地募军三千人,赶赴辽东战场——跟当年曾国藩率兵办团练一样,但魏光燾注定不是第二个曾国藩,时过境迁矣。

在牛庄,三千湘军,遭遇了两万日军。战斗持续一昼夜,从清晨开始,午夜结束。牛庄无险可守,守军与敌军,展开了残酷的巷战。牛庄之战,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巷战。湘军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,此次仓促成军,在苦寒之地作战,武器也远不如日军,但,湘军血性仍在。此役后,魏光燾回忆说:“雪天冰地,兵勇喘息未定,适倭寇由沈阳纠股二万余众来扑。余督兵御之,血战竟日。余坐骑凡三易,究以众寡悬殊,援兵不至,死亡过半,且无精利枪炮,兵少械窳,力不能支,始退驻田庄台……”

日本人对牛庄之役,有相当详细的记载,《东京日日新闻》战地特派记者黑田甲子郎亲自目睹了牛庄城“路旁扶尸相枕”,酒店门前“筑成形的尸山之间流出几条浑浊的河河”之惨状。日军死伤惨重,不得不承认“我军战败困苦”。

魏光燾殉国的时候,日军到处狙击,在各街口要道筑火,切断清军退路,“我军肝脑涂地,惨死万状”。一直到子夜零时分,魏光燾等才脱离险境,余部已所剩无几。来不及突围的湘军士兵,全部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。今人说起甲午战争,多言清军畏缩不前、斗志全无,并非都是真实历史,至少,牛庄一役中的湘军,是英勇无畏的。

但是,牛庄,却成了湘军悲壮的谢幕之地。

那一支由饱读诗书的儒生带领坚韧淳朴的农夫组成的雄师,起于乡野,苦战经年,攻克金陵,中原镇抚,平定西北,收复新疆,兴办洋务,抗击法军……他们转战了大半个中国,四处灭火,曾经让垂死的清朝,一度有中兴的迹象,但这个颓废帝国的衰败,是全方位的,就如甲午之败,是系统性的溃败。湘军无法再一次拯救清朝了,甚至无法拯救自我。

牛庄,湘军的一个句号。

二

甲午战争,逼出了戊戌变法,也逼出了一个“新湖南”。

第二个湖南人登场了,他叫周汉。周汉这个名字,今人已非常非常陌生了,但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十余年,周汉是一个在民间具有超级影响力的煽动家。

他是宁乡人,年轻时读过不少书,后来投笔从戎,加入湘军,与魏光燾当过同事,在新

“说起戊戌变法,绕不开一个人:谭嗣同,他是湖南人。湖南,也是中国近现代史无法绕过的一个省份。本文以湖南为观察点,来写四个已被时间淡忘的湖南人,时间环环相扣,命运载沉载浮,他们的命运也记录了中国一段大历史

► 康有为(左上)、梁启超(右上)、谭嗣同(右下)。
新华社资料片

疆打过仗,因功被保荐为陕西补用道,一个没有实职但可领薪饷的闲官。他不愿意这么混日子,1884 年,他回到长沙闲居,开始了他的另外一项事业:出版。如果要给周汉和他的出版物下一个定义,应该叫作“狂热地盲目排外”。他在闲居长沙期间,其实一点都没闲,花了大量时间撰写反对洋人洋教的文字,鼓吹诛杀洋人,驱逐洋教,然后大量印刷,免费散发。他是个读书人,又长期在军队,深谙用俚俗的大白话来迎合底层民众认知能力之道。他迅速出名了。

周汉之暴得大名,离不开当时湖南的土壤,封闭保守。甲午战争之前,湖南一度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,当湘军拯救了清朝的同时,也让湖南人长期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地域优越感之中。湖南人的性格本来就固执与顽强,加上地处内陆,与沿海省份相比受国气影响较小,仇洋排外的心理较强,社会风气趋于保守。美国学者裴士锋在《湖南人与现代中国》一书中写道:“在周汉眼中,洋人横行中国,乃是因为朝廷无能,未能将他们拒于门外;因此,湖南人得团结起来不让他们入境。”湘军崛起后,更给了湖南人另外一个排外的充足理由:太平军就是受洋教影响的,湘军已成功打败了他们,以后也要确保不受任何来自外国的东西侵犯,因此,湖南“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”。

从郭嵩焘的遭遇,就能看出当时湖南保守之状况:郭嵩焘也是湘军大佬,后来受命担任首任驻英公使,结果遭受巨大冲击,冲击主要来自湖南老家,什么话难听就拿什么话骂他,他的宅子被聚众围攻。郭嵩焘的痛苦可想而知:在亲身体验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回到家乡后,周边却全是对对其进行大肆人身攻击的老乡,后者以此表明自己拒绝开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务之决心。《湖南人与现代中国》一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:“郭嵩焘最风光时,宣讲的对象一次顶多只有五十个观众,而周汉的一本小册子,据知就印了八十万份。”

辱骂郭嵩焘众所周知的一句话中,是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”,当时湖南人把洋人叫作“鬼”,这也是周汉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字,在《湖南通省公议》里,周汉号召湖南民众全部起来“驱鬼”,如有敢阻挠、为“鬼”说话者,立即击杀,尸体弃之荒山以喂恶狼;如有敢将土地房屋卖给“鬼”者,将业主与经办人全家杀尽,产业充公,作为“灭鬼”经费。在周汉的煽动资料里,郭嵩焘被丑化为“四鬼”之一,曾国藩的儿子,优秀的外交家曾纪泽,也是另外一“鬼”。

郭嵩焘郁郁而终,他死后 4 年,湘军覆没于牛庄,湖南人,惊醒了。

牛庄之役后,湖南多出无数新坟,亲人披麻戴孝,恸哭不已,而更多的湖南人,茫然失措之后,开始反思,“咸名赫赫之湘军亦败,且较诸军尤为大败……湖南人始转侧踴痛,其虚骄不可向逆之气亦顿偃矣”——甲午战争之后,谭嗣同在给老师欧阳甲中贺信中如是写道。他认为,湖南人因甲午战败而敲响警钟,结束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态,这种惨痛的教训亦可以视为是中国挫败中的一丝曙光。可以说,正由于之前的闭塞,甲午战争对湖南人的刺激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层。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为其他省份的人所没有,给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带来了机会,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变而为“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”。

转眼间,湖南从万马齐喑的排外格局,一跃为维新运动时期全国最激进的省份,从官员到士绅到知识分子,纷纷觉醒:官员陈宝

开放会倒逼改革,没有开放就缺乏改革的动力。”

伍新木说,“后来与沿海城市相比,武汉的改革开放滞后了十几年。”伍新木说。

武汉市体改委在 1992 年的一期《湖北社会科学》上,发表三论武汉市改革开放,“在这几年的改革浪潮中,武汉在全国的‘率先’不见了,翻开报纸,看到的是徐州、珠海、重庆率先……苏州、无锡,越来越多的城市超过来了,武汉工业产值的位次下降了十几位。形势逼人,形势催人,事实在向我们惊呼:武汉不加快改革的步伐必将成为‘沉舟’!”

在这个国家老工业基地,改革的放缓,开始推倒国有企业倒闭的“多米诺骨牌”。武柴所在的古田工业区,分布着大大小小 100 多家工业企业,曾是武汉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,此后数年间,其中绝大多数被破产潮席卷而去。



箴、黄遵宪、江标、徐仁铸等人开明开放,吸引了大批维新骨干入湘,湖南成了维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,推动湖南维新走向高潮,而本土年轻知识分子谭嗣同、唐才常、熊希龄,在维新大业中脱颖而出……人人热烈拥抱维新大业,他们立誓:改变中国,先从改变湖南开始。事实上,湘军牛庄之败,也刺激了谭嗣同,从一个保守派变成一个激进派。他,很快就要震惊中国。

三

1898 年 8 月,与谭嗣同一起进京的,是本文第三个湖南人:毕永年。

这个名字,在历史中湮没久矣,但在当年,绝对是一个等一等的猛男,长沙人,他在戊戌变法中的特殊使命是:带领一百个好汉,冲进颐和园刺杀慈禧太后。

那个年代,湖南盛产既熟读诗书又武功高强的年轻小伙,谭嗣同是一个,“偶倪有大志,淹通群籍,能文章,好任侠,善剑术”;“五四运动”时率先冲入曹汝霖住宅,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是一个;毕永年也是一个。毕永年是湘军子弟,从小在军营长大,练得一身好武艺好胆识,读书成绩也相当不错,考取过拔贡。跟随谭嗣同进京后,认识了康有为,后者一看毕永年侠肝义胆的模样,就很留意,在他后来“围园杀后”的设计中,毕永年成为一个关键人物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,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,否认“围园杀后”的计划,袁世凯在《戊戌日记》提到的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游说时提过“派湘籍武士百入袁军,围园时的杀后任务由他们完成”,也被说成是出卖者袁世凯的诬蔑,不可信。一直到后来历史学家在日本找到毕永年流亡日本时写的日记,历史学家杨天石据此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:《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》。

在日记中,毕永年记录了行动开始前,康有为与他的秘密对话。一则为:“或以百人交汝率之,何如?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,汝则率百人奉迎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。”另外一则是梁启超转达康有为的命令:“顷梁君谓我云,先生(康有为)之意,其奏钢皇上时,只言废之,且俟往颐和园时,执而杀之可也。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?”

众所周知,因为袁世凯的告密,计划破产,变法失败,六君子遇害,光绪帝被软禁,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。毕永年,也逃到了日本。

变法,在中国,从来就不容易。鲁迅先生当年沉痛说过:“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,即使搬动一张桌子,改装一个火炉,几乎也要血;而且即使有了血,也未必一定能搬动,能改装。”后人回溯戊戌变法,既扼腕叹息,又深以为憾。变法者,操之过急,不知道变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,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,如果缺乏良好的顶层设计与实操方法,不可能成功。光绪当年太急了,他认为架空老人老臣、重用新人小吏,就能推行变法;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太急了,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,即可一逞其志,毕其功于一役。

史载,变法初期,6 月 16 日,康有为在朝房等候光绪召见,碰遇荣禄,谈及变法,荣禄说:“法是应该变的,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,怎能任短期内变掉呢?”康有为忿然作答:“杀几个一品大员,法就可以变了。”后人再读这段话,不禁摇头无语。其实,康有为策划的“围园杀后”,就是基于这一逻辑:去掉最主要的阻

碍,变法就能成功了。但这些急躁的变法者哪能料到:他们根本无法除掉自己想除掉的人,而一心想除掉的人反过来要除掉他们,却轻而易举。

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《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》一文中评价道:“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,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。诏书一日数下,朝野莫知所适,也不是个办法。不幸这位年轻皇帝,显然感到国亡无日,所以迫不及待。但是他的军师谋臣,应该有见及此。不幸康某(注:指康有为)木讷执拗,识见不足,而操切浮躁,且有甚于幼主——言念及此,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。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,而开了倒车。”

被康有为之中的湖南绅士毕永年,未来得及一展身手,变法已经失败,缇骑四出,捕杀新党。毕永年只得东渡日本,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,加入了兴中会,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派。他策划了多次起义,屡战屡败,心情压抑,再加上劝好朋友唐才常与康有为脱离关系,遭拒绝,一怒之下,万念俱灰,去寺里当了僧人。他出家后,史载:孙中山如失左右手,四处寻找他而不得。

四

第四个湖南人,叫李闰。她是谭嗣同的妻子,18 岁嫁给他,丈夫就义后,她自号“更生”,取的是丈夫狱中诗句“忍死须臾待杜根”之意。

李闰很爱自己的丈夫,谭嗣同北上后,她牵肠挂肚,对月焚香,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。她在日记中写道:“如有厄运,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。”

谭嗣同确实是一个伟男子,戊戌变法失败后,他完全可以脱身,却留下来从容赴死,他的一段话,至今读起,仍让后人热泪盈眶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,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他在这走向菜市口刑场的路上,被愚昧的民众扔菜叶、烂鸡蛋,他还忍受着刽子手的折磨,人落地头低,看客轰然叫好……但他认为自己的死,值得。

他也很爱自己的妻子,两人虽是包办婚姻,却也心灵相通。她给她写信,开头都是“夫人如见”,有一封信上,他写上“视荣华如梦幻,视死辱为常事”,他不害怕“死辱”。这个湖南人坚信,自己的死,值得。

在今天的湖南省博物馆,还珍藏有谭嗣同给李闰的一封信札,写于其抵达北京准备应召觐见光绪帝之时,此后,他无比忙碌,再也没有时间从容写信了。这封家书是这样的内容:

夫人如见:在鄂连寄数信,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,本月初五到京,事之忙迫,追不胜述。朝廷毅然变法,国事大有可为。我国因此益加奋勉,不欲自暇自逸。幸体气尚好,精神极健,一切可以放心。此后太忙,万难常写家信,请勿挂念。寄上《女学报》及女学堂书各一包,此后如欲看《女学报》,可开出报费之单,请唐次受托人去买。唐若不能,可径托大兄设法在上海购买也,或函托泰生弟更好。我七八可引见。此上,即颂坤安。

复生手草 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

他始终惦记着要让让自己的妻子跟上这个时代,李闰也没让他失望,丈夫生前,她带领家中的大足仆走上街头,宣传不缠足的好处,呼应丈夫发起的不缠足运动,她还是中国女学会的倡办理事。丈夫遇难后,她参与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,还担任这个学校的总学监,然后又建立了浏阳第一所有婴局。史载:浏阳女子师范学校,是湖南也是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,不仅为浏阳女性的培养和教化做出了巨大贡献,更是促进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开放。

李闰余生都在对丈夫的思念中渡过,漫长的时光中,湖南,中国,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

毕永年在 1903 年因病去世,跟谭嗣同一样,生命都定格于 33 岁;周汉死于 1911 年,他在戊戌变法的 1898 年因为挑起教案被判终身监禁,他死的这一年,辛亥革命爆发,就在同一年,为拯救危局,清廷启用魏光燾任湖广总督,因为当时起义军,多是湖南人,魏光燾拒绝上任,5 年后,他寿终正寝。李闰活到了 1925 年,60 岁。六十大寿时,康有为与梁启超给她合赠“巾幗完人”的匾额。

这四个字,她当之无愧。

身,都需要别人搀扶着。

武汉市外国专家局原局长周健文,还记得那次接待他的情景,车子几次到了解放大道的时候,格里希都会指着宝丰路的方向,嘴里不停念叨着“这就是去我工厂的方向”。

在武汉那些天,这位老厂长执意要去看看武柴。为了不让老人伤心,周健文和同事们,不得不借口工业区改造搬迁,编了一套复杂的善意谎言,几次婉拒拒绝了格里希的要求。

武柴,成了格里希再也回不去的第二故乡。2003 年 4 月 17 日,格里希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。两年后,武汉市制作两尊格里希铜像,一尊坐落在汉正街都市工业区,另一尊赠给了杜伊斯堡市。

铜像基座上的一段文字写着:格里希……1984 年至 1986 年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

单地

往事

本报记者朱泓

前不久,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·霍金在位于剑桥的家中去世,享年 76 岁。霍金在中国很受欢迎。1985 年以来,霍金曾数次到访中国。2002 年,他第二次到访中国时,在杭州停留了 8 天。在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邀请下,霍金在浙江大学举办了一场公众演讲,引发了一场科学风潮。霍金逝世之后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采访了当时陪同霍金一行的教师、学者,还原出了 16 年前那场“霍金旋风”。

爬上屋顶看霍金

2002 年 8 月 15 日是霍金在浙江大学作公众演讲的日子。当时正值暑假,但学生们热情不减。据时任浙大新闻办主任徐有智回忆,校方原定的场地能容纳 700 人,在征集听众时,报名人数超过了 1500 人。报名的大多数是学生,还有人特地从外地赶来。为满足大家的要求,校方临时把演讲的地点改到了能容纳 3000 人的邵逸夫体育馆。霍金将他的中国之行和在杭州的公众演讲称为自己“神圣的义务”。《时间简史》和《果壳中的宇宙》译者、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吴忠超作为霍金的学生,承担了演讲、记者招待会的翻译工作。吴忠超在回忆录中写道,浙大派发的演讲票是免费的,可在会场外,演讲票被炒到了 400 元至 500 元一张。演讲当天,3000 人的体育馆内,连过道、座位后排都站满了人,即便如此,仍有大批学生没能如愿进入现场。“有的学生拿不到票,为一睹霍金风采,想办法爬到了体育馆屋顶上。”浙江大学原校办主任王立人说。演讲开始后,霍金自己驱动轮椅驶上讲台。“我们可能生活在更大空间的一张膜或它的表面上。”吴忠超回忆说,霍金以这句简短的话开始了名为《膜的新奇世界》的演讲,台下 3000 多位听众鸦雀无声。借助 3 个手指操纵按钮输入语句,再经由语言合成器发出声音,霍金的声音在体育馆的上空回荡。这场演讲从上午 10 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近 1 点。演讲结束时,座无虚席的现场爆发出长达 5 分钟的热烈掌声。

整个杭州都知道霍金来了

“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,仍自以为为无限空间之王。”在霍金第二次来到中国的这一年,他的第二本作品《果壳中的宇宙》正以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同步发行。《时间简史》则早在 1993 年就在中国出版。这次中国行之后,他的两本书更成为杭州大小书店中的畅销科普读物。吴忠超在回忆录中写道,霍金在一次晚餐时的交流中,在电脑中写下:“1985 年我首次访华,那时候我并不出名,和这次一样,人们总是围观我,那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。”事实并非如此。霍金在杭州的 8 天里,媒体给予了持续的高度关注,这也让更多老百姓认识了这位轮椅上的科学巨人。很多人也许并不完全理解霍金的学术成就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敬仰一位饱受病痛困扰,却没有一刻停止思考的奋斗者。

在杭州期间,霍金除了参与学术活动,还曾前往西湖、河坊街等地游览。每到一处,霍金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“整个杭州都知道霍金来了,”王立人说。

“大家感觉到霍金是个伟大的科学家,他关心宇宙、关心人类的命运。大家对他和他的研究都好奇,霍金的到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科学、喜欢科学、热爱科学。”徐有智说。

喝完米酒,我能解决 M-理论了!

在到访杭州的 8 天里,霍金金句频出,他的幽默乐观和旺盛的好奇心给陪同人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吴忠超回忆说,霍金在杭州出席记者招待会时,有记者问:“你认为下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?”霍金回答说:“如果我知道的话,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。”霍金一面说,一面看着吴忠超,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。

还有记者问霍金如何评价牛顿、爱因斯坦和他自己。霍金回答说,在科幻片《星际航行》中,他曾与牛顿、爱因斯坦打牌较量,结果是——他赢了。

在科学研究之外,霍金最大的快乐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。吴忠超说,霍金的父母 1966 年曾游历杭州,并带回一幅织锦保存至今,因此霍金对杭州有一份特殊的渴望之情。

在杭州街头看到茶楼表演时,霍金目不转睛;经过臭豆腐摊,他好奇询问;在一家文艺摊,他收到了竹编的蛟龙和鳄鱼各一条,便立即示意助手摆放在自己眼前的电脑上。

吴忠超说,一次晚餐时,霍金还尝试了中国米酒,之后他兴致高昂地在电脑上打出一行字:“我能解决 M-理论(M-theory)了!”并按动语音合成器,发出酒后豪情。

“尽管行动不便,讲话、打字很吃力,他始终保持一颗对科学、生活的好奇心。”王立人说。

(上接 9 版)

回不去的第二故乡

“当我最后一次从武柴工厂的大门走出来时,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。武柴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它是个可能在我的生活和记忆中轻易地抹去的。”半个多月后,在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张劲夫的见面中,格里希说出了对武柴的留恋之情。

回到德国后的格里希,仍然心系他的第二故乡,此后十几年多次回到武柴。他在中国的足迹,还遍布北京、上海、海南、内蒙古等地,受邀为政府提供工业发展咨询、为企业做技术指导。

不过,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前,武汉并没有像沿海城市一样大力引进外资、对外开放,“对外

间,忘我工作,大胆改革,从严治厂,为中国企业改革、增进中德人民友谊做出重要贡献。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“友谊奖”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“十字勋章”、武汉市人民政府“黄鹤友谊奖”、武汉市“荣誉市民”称号和在华永久居留资格。

(稿件部分内容参考《格里希在武柴》、新华社报道以及《长江日报》报道)